

刘少奇的求实精神与改革思想

卞杏英 徐剑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刘少奇一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唯心论、形而上学等错误思想和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在纪念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之时,我们要学习、发扬这一精神和思想,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制定党的政策的重要依据。刘少奇在领导我国土地改革中始终坚持从当时实际出发,正确把握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从而保证了土改政策的正确。1946年“五四指示”到1950年的土地改革政策,前后经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其政策变化是必然的,不能由于后者实行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来否定前者的过渡性。刘少奇起草“五四指示”之所以是不彻底的土改革命纲领,并不是右倾表现,恰恰反映了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正确制定由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耕者有其田政策。这种过渡性的政策核心问题是“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①以“有偿方式”使土地从地主手中转到农民手里,是从实际出发的。刘少奇在1947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总结这一事实时指出:“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②其一,内战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尚未最后关闭和平大门,蒋介石的不要和平,准备内战阴谋人民尚没认识清楚,有一定的欺骗性,如果党发动土地改革,彻底平分土地,蒋介石利用此发动战争,“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是因为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③其二,如果根据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不要和平要发动内战的估计就“决定

不和的政策,那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④。“五四指示”不算错误,应当加以肯定。到全国内战已经打起来后,在总结各地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后,党及时制定《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土地改革搞彻底,群众发动好”,“农民都起来革命,蒋介石有什么办法呢?”刘少奇高度评价土地改革作用,他说,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实行土地改革是“争取爱国自卫战争胜利最基本的一项,有决定意义的一项,胜利意义的一项,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就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⑤

在对待富农和富农经济问题上,刘少奇根据国情,坚持求实精神,制定正确政策。他坚持富农小地主有所区别,富农经济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地主是封建经济的代表,所以应当区别不同政策。“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⑥所以“五四指示”中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方针。解放战争中实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这是考虑到在战争紧张的时候,“富农不会拥护我们,也不会站到我们一边”。^⑦建国初期,“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就要保存富农经济。”^⑧对待富农问题采取的不同时期不同政策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体现。同时,刘少奇也指出: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⑨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刘少奇的保存富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暂时不动半封建半富农经济”思想的发展。在我国农村,富农一般占有较多的土地,较好的生产资

料,同时剥削雇佣劳动,有的还经营工商业。富农经济在旧中国发展比较缓慢,全国除少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富农采取了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外,一般地区的富农仍处在小农经济状态。富农经济在我国农村虽然不占优势,但它代表着我国农村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如能得到保护,允许其在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对促进农村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很大作用。刘少奇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主张。很明显,我们避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模式所造成农村生产力衰退的失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作为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能解放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一条中国特色的土改路线,其功不可抹。刘少奇的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并不是无条件的。他指出:“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⑨刘少奇在马列学院演讲中特别强调,“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讲过了,但是要处理中国的土地、农民问题还要靠我们创造,还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⑩

二

刘少奇在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揭露分析工作中的失误,正确对待成绩和缺点,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的危害,在1959年中已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但没有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而且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要求继续“大跃进”。结果,到1960年,全国经济处于更加困难的局面:工农业生产下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面对这种严峻的困难形势,党中央认为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7月上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任务,并确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工业要支援农业等重要意见。

全国经济形势是不是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整个国民经济要不要进行调整?当时党内特别是高

级干部中,对这个问题认识很不一致,有的同志甚至不赞成对经济进行调整。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作出科学判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在湖南调查研究过程中,他批评了不务实的歪风,严肃指出:“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⑪刘少奇又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进行了调查。他在1961年5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当时经济困难原因作了正确的分析:“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是怎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⑫这样打破了长期习惯分析成绩与缺点的定式。刘少奇在如实分析产生经济困难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措施: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的,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党内外树立了榜样。

刘少奇指出会议的宗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刘少奇的报告总结4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这个报告:第一,实事求是地估计了过去4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他反复说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成绩是跑不了的,缺点错误也是不能否认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刘少奇尖锐指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⑬刘少奇认为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地由干部和群众去评价。

第二,实事求是地分析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他指出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缺点错误造成的。用湖南农民的话说,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第三,实事求是地估计了当前形势。当时有许多人对经济形势估计不足,直接影响调整国民经济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刘少奇认为有必要让大家

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⑧“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认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⑨

1962年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对经济形势作了进一步透彻的分析，对1958年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针对一部人仍对困难的形势认识不足，对调整的必要性缺乏紧迫感，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看？我看应该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你们回去跟省委书记讲一讲，然后大家才好讲。”^⑩刘少奇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要估计够，要估计到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思想上有准备，才能自觉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纠正失误，促使经济形势好转。事实证明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

三

刘少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不囿于成规，而敢于解放思想，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探索。他的改革思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历史经验。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和价值规律进行了探索。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对商品活动范围曾经存在不同的看法。斯大林认为商品活动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刘少奇对此提出不同观点，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发言谈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插话说：“生产

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⑪后来，刘少奇又在一次汇报会上指出：“管理工业品生产资料的物资部门也是个商业部，要基本上照商业部的办法。”^⑫

刘少奇强调尊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并付诸实际指导生产实践。1961年4—5月间，他在湖南调查中，针对当时许多不合理的价格造成的生产不合理情况，指出：有些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少了，应该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价格定得不合理，不仅妨碍生产，而且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他还批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实际是割社会主义的肉。他主张少搞派购或不搞派购，改为与农民签订购销合同，实行工农产品等价交换。这一改革思想，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强调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不能混淆。

“大跃进”中出现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把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这种突发性的生产关系变革，脱离了生产力水平，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混乱。刘少奇在1962年初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短的时间完成，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所有制界线，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违反了客观可能的条件和农民自愿，要过早过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就会犯剥夺农民的错误，就会损害以致破坏工农联盟。”^⑬刘少奇这些意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反映了群众的要求。他的意见被中央采纳，实行了退赔政策。

(三)初步探讨农村和城市的改革。

1956年刘少奇到河南新乡考察时，对新乡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很为赞赏。称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合作社太大了与落后生产力不适合。他指出：“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⑭将来有了拖拉机，就非大不可。他强调说：根本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基本没变。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主权，适合于历史习惯，适合于人们的管理水平，适合生产工具，适合生产力，这一点是可靠的。刘少奇主张劳动者要有一定的自由，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社员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

“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内作完，随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人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②这是最早提出的责任制问题。以后我国的农村改革正是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面对公私合营以后，各地出现了不少地下工厂和私商。毛泽东认为，地下工厂的发展，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刘少奇十分赞成毛泽东意见。刘少奇说：“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1956年12月，他在一次会上说：“有些资本家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准许他们盖呢？可以的。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③刘少奇还主张增加个人经济活动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④1957年3月在湖南听取教育工作汇报时，他还提出，对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多些自由活动的余地。中医，可以实行互助的办法，使技术高、收入多的，不必在联合诊所。单干、互助、合作社都应该允许。私人办学、办托儿所、行医，政府不应该收税，不应该看作资本主义行为，应看成社会服务工作。他反复强调，总的是要灵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不难看出，刘少奇在50年代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

(四)对教育、文艺、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设想。

1956年到1957年，全国出现了学生升学难的问题。上学的人越来越多。国家不可能办那么多学校，许多青少年不能上学。矛盾越来越尖锐。怎么办，刘少奇在1957年初沿京广线南下五省考察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提倡民办学校和勤工俭学的主张。他提出，除国家办学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还可以让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试图从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根据当时中国家庭一般有四五个孩子上学，一般工人农民家庭负担不起，又要普及教育，减少

国家和家庭负担，他设想搞半工半读的制度。可以说两种教育制度是符合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情况。

在劳动制度方面，他还提出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他认为不许解雇，全都包下来了，劳动力也不能调剂，技术好，工作好的职工也捆住拖住了。他主张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施行合同制。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思想是刘少奇改革思想的主要体现之一，这是根据国情民情的创新，也给今天这方面改革提供了借鉴。

(五)提出试办托拉斯。

他提出按经济规律、按大生产要求的客观经济联系，用托拉斯亦即企业联合体、经济联合体这种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中央同意刘少奇建议，赞成在广东办托拉斯，批准并决定成立中国烟草公司，统管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工作。随后在1964年8月，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国家经委党组报告，决定在工交部门再试办11个托拉斯。试办这些托拉斯，取得明显经济效果，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综观刘少奇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漫长的征途中，刘少奇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勇于改革，敢为人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求实精神和改革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上海师大法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 邮编：200234)

①②③④⑤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8、386、386、386、395、378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刘少奇选集》下卷50、50、40、40—41、50、337、421、418、419、445、362页。

⑲⑳㉑㉒㉓《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13、379、388、388、382—383页。

㉔《毛泽东思想史纲》黄河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㉕《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第193页。